

文物“四普”队员在广州白云山确认明代黄佐家族墓群——

重新认识一位“被低估的岭南大儒”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邓琼 实习生 熊安娜



黄佐的祖父黄瑜、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的三座墓葬依山而建，按辈分由上至下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壹 惊喜成果：考古新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羊城晚报：近日，黄佐家族墓群在白云山上被发现。相关消息发出后，您也特别关注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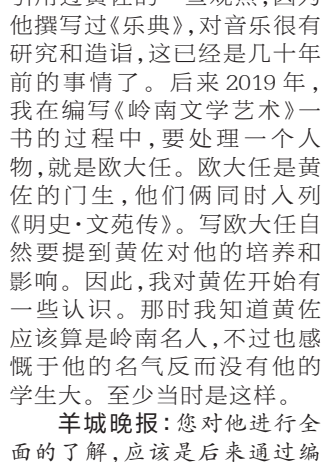
董上德：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黄佐父母葬在白云山上，这在文献中有记载。现在确认在白云山找到黄佐家族的墓地，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刚好跟文献相互印证。

黄佐（1490年—1566年），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祖籍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被认为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

黄佐（1490年—1566年），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祖籍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被认为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

然而，相较于其他岭南著名学者，黄佐较少被后人提及。2022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完成《“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一书的编选，并撰写长篇前言，梳理和推介黄佐的著述及生平经历。

广州白云山黄佐家族墓群在“四普”中被发现之后，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董上德教授进行专访。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摄

先后来客死异乡，最后才被送回广州安葬。

明武宗正德五年，黄佐举乡试第一。正德八年七月，黄佐由父亲黄畿陪同，启程北上，准备参加会试；途经仪真（今江苏仪征市），时在十月，黄畿不幸病故，黄佐不得不扶柩而还，其京赴试可谓半途而废；嘉靖十九年，朝廷命黄佐掌南京院事。

嘉靖二十四年，黄佐将父母合葬于白云山聚龙岗。这件事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儒者，一位经学家，黄佐一直践行着“孝亲”的准则。

羊城晚报：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能否推测黄佐晚年的生活境况？

董上德：四百五十多年过去，很多细节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但是泰泉书院是他晚年花了很大心力营建去讲学的地方。根据文献记载，泰泉书院

贰 一个“斜杠”人物：著作丰，门生众

羊城晚报：您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戏曲史研究，最开始关注到黄佐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吗？

董上德：这个说起来也有些微妙。我在戏曲音乐研究中论述过戏曲音乐美学时，曾经引用过黄佐的一些观点，因为我撰写过《乐典》，对音乐很有研究和造诣，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董上德：我在编写《岭南文学艺术》一书的过程中，要处理一个人物，就是欧大任。欧大任是黄佐的门生，他们俩同时列入《明史·文苑传》。写欧大任自然要提到黄佐对他的培养和影响。因此，我对黄佐开始有一些认识。那时我知道黄佐应该算是岭南名人，不过也感慨于他的名气反而没有他的学生大。至少当时是这样。

羊城晚报：您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应该是后来通过编

就白云山上距离黄佐父母坟墓不远的地方。他一边讲学，一边纪念父母。同时，“泰泉”有“永泰之泉”的含义，是岭南人讲究意头的表现。“永泰”的美好祝愿既对家，也对国，寄托着黄佐的家国情怀。应该说，讲学、授徒，还有修地方志，是黄佐晚年的主要工作。

羊城晚报：黄佐虽为香山籍，但是他出生、学习都在广州，上至其祖父黄瑜，他们一家与广州有怎样的联系？

董上德：黄佐于明孝宗弘治三年出生于广州承宣里，可以具体到街巷名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家早年从江西南下来到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黄佐的祖父黄瑜后在广州置业，举家搬到这里。

黄佐天资聪颖，从小得到祖父黄瑜、父亲黄畿的悉心教养。但他的仕宦生涯却起起落落、波折不断，一直在外奔波和回粤讲学之间来回奔波，因此他跟广州的渊源特别深。

皇帝登基后，黄佐最开始对他抱有一种期盼，希望新皇帝有新作风，这在他的诗歌《伏读嘉靖登极诏有述》中有所体现。

羊城晚报：随着对黄佐研究的深入，您如何评价他？

董上德：我总结黄佐是一个“斜杠”人物。他是经学家，经学是黄佐的家学，他著有《诗经通解》《泰泉乡礼》《乐典》等经部著作；他是思想家，从经学出发，黄佐尊崇宋儒，尤其是二程和朱熹，进而潜心于理学，成为一代理学大家。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专立“泰泉学案”，高度肯定黄佐在思想上的成就；他也是文学家，诗歌和散文都写得非常好；他还是方志学家，这是后人公认的；最后他还是教育家，其门下的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巨被称为“南园后五子”。因此，黄佐拥有多重身份，我们很难简单定义他。

叁 与王阳明交往：体现不盲从的岭南学风

羊城晚报：《明史·文苑传·黄佐》记黄佐曾与王阳明相会，“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辩难”。他与王阳明的相会是如何发生的？

董上德：在明代理学史上，黄佐与王阳明的两次相会可以算得上是儒林雅事。他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嘉靖二年，第二次是嘉靖七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那年。说起来有个很重要的机缘。

嘉靖二年，黄佐此时已有官职，他从北京南下江西出差，途中经过杭州。据黄佛颐《文裕公年谱》记载，黄佐在杭州与同窗梁焯重逢，而梁焯又是王阳明的门生，因此梁焯作为中介介绍黄佐去拜会王阳明。

《文裕公年谱》记载，黄佐与王阳明论及良知话题：“公（黄佐）曰：‘知犹目也，行犹足也。虽乃一时俱到，其实知先行后。’王公曰：‘君太信宋儒。’公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岂宋儒耶？夫子亦曰知之未尝复行也。’王公叹曰：‘直谅多闻，吾益友也。’”

可以看到，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黄佐则认为“知先行后”，知识是实践的前提，但他同时强调实践比获得知识更加困难，重点落到实践上。两人见解并非完全相合，但王阳明仍视黄佐为“益友”。

羊城晚报：他们二人的交往有什么文化意义？

董上德：我们都知道当时王阳明的影响很大，明中后期，他的思

想被各个阶层的人接受。但是我们广东的学者，湛若水也好，黄佐也好，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权威，还是抱着一种互相尊重、各自表述的岭南学风。也就是说，岭南文化人不会轻易地去盲从什么，他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反正能接受的我都接受，不能接受的我们可以讨论，探寻真理。我想这个从黄佐、湛若水跟王阳明的交往里就能看到。

羊城晚报：黄佐在诗歌上的成就同样很出色，后人尊之为“粤之昌黎”，朱彝尊称他为岭南诗派领袖。其中“粤之昌黎”的评价，是指黄佐的诗风像韩愈，还是诗作成就堪比韩愈？

董上德：我是这么理解，苏轼评价韩愈的文风“文起八代之衰”，是指他的影响力。我们不一定把黄佐比作岭南的韩愈，或者说他的诗文成就堪比韩愈，而是说黄佐的诗文同样能起到改变风气的作用。

黄佐以经学起家，从经学到理学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在理学里面，“格物致知”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方式，黄佐作为一个理学家，同时他内心又饱含诗情，那么他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观察人间百态的时候，很自然地用到“格物致知”这样一种观察角度，他的诗歌将诗性与哲思融会贯通。所以，他的诗一方面富含哲理，另一方面比较敏锐地把握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细节，是观照现实的。

肆 拥抱历史现场：重新审视岭南学人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岭南文化名人，我们对黄佐的认识似乎有限，您也多次提到，“黄佐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的史学大家”。他被低估的原因是什么？

董上德：这个问题我也还在寻找答案。按理说，黄佐名气本来就不小，否则他怎么能进入《明史·文苑传》？他肯定是个个人物！

那他为什么会被人低估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几个原因。“五四”以来编成的文学史，讲到明代都会强调小说、戏曲的繁盛；提到诗文，更多是讲“复古”和“反复古”的思潮，很少对明代的诗文做一个更全面、深入的阐述，文学史上本身有点不重视。前有唐宋的诗文，后有清代的诗文，都是高峰，而明代刚好有个洼地，成就相对不算太高。当然明代并非就没有好的诗文，这类类似于文学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是长期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

因此，黄佐的诗文就不容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再加上黄佐留下来的诗文数量不算多，起码不像他的门生欧大任那么多。黄佐著作的流通不如明清的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其他岭南学人那么广，甚至同属香山籍、近代的苏曼殊的名气也远超黄佐……在我看来，这与黄佐著作的普及程度不如上述诸人不无关系。但黄佐和他的弟子欧大任、黎民表同入《明史·文苑传》，陈献章、湛若水两师徒同入《明史·儒林传》，这就构成一个内在的关联，即岭南人物在明代的文学史的建构上是多侧面

的，是互补的，这也是岭南文化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另一方面，黄佐著作不少、门类也多，本身就不容易被定义。他对各个门类很精通，但相比其他文化名家，又不算那么拔尖。他尤为擅长地方志编修，在当时方志学也不算主流的史学，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黄佐这个名字有点尴尬。但是总体来讲，黄佐是很有贡献和成就的岭南文化大家，这样评价并没有拔高。

羊城晚报：当下我们谈论黄佐，有什么现实意义？

董上德：谈黄佐谈了那么多，不是要“追认”他的名气，他的名气在历史文献中早已明确记载下来。但我们可借这一次白云山黄佐家族墓地发现的契机，拥抱历史现场，回到明代的历史场景，以黄佐及其家族为个案，重新审视一个岭南人在明代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和贡献。

我们看到正德、嘉靖这一段在明代发展史上起着转折的作用，整个政治生态、社会环境都发生着重要变化。黄佐眼中的“嘉靖史”对我们来讲，会比读正史更加鲜活，因为他有见证人。

同时，我们看到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还有像黄佐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关心家国大事，又兼顾家庭，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努力着，艰难地奋斗着。我们要重点关注黄佐这个岭南人物如何跟时代相遇，在相遇过程中，又如何留下后世的作品。这应该能给当下的学者以启示。

琐谈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书生”讲述的中国故事

□肖祯文

王春晓喜欢以“书生”定义自己。给我的感觉，他是有些“迂腐”的，家里和办公室中都堆满了书。时至今日，他仍还顽固地保留着书生的风雅之性，偶尔写诗作对、舞文弄墨。但他却从未停止钻研求真的脚步，一直跟踪关注全国的医改探索。早在2013年底，他就把当时还寂寂无名的三明医疗改革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正如李玲教授在《三明医改：政策试验与卫生治理》书序中所言，此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因为下了很多实在功夫，本书围绕“三明医改”的写作细腻而生动，像是拍摄了一部高质量的“纪录片”，从中可以窥见“趟过改革深水区”是如何的曲折艰辛，并切身感受到地方实践探索者的智慧与韧性。该书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在对改革成功与否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侧重从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三明故事”、摹画“改革群像”，抓住改革过程中看似不起眼但却极为关键的细节场景，引人入胜的文风吹散围绕三明医改的面纱。

细读之下，读者对作者的赤诚用心也会有真切感受。行文至终章，王春晓从三明模式出发，就国家卫生治理现代化提出了真切而深沉的个人思考。这与三明医改的亲历者詹富并未在三明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后停止探索，有异曲同工之处——“萤火虽微，但为其芒”。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袁隆平“书生”，需要一大批从事精神文化探索的钱学森式“书生”，也需要一大批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的詹富式“书生”。同样，我们也需要有更多“中国故事”讲述者，传递时代前行的真实声音，向世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丰富面貌。



序跋

吴冠中这样评价：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

他也是中国美术史绕不过的人物

□萧薇鸣

2010年，我曾编写过一部《鲁迅美术年谱》，一晃已过去十多年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鲁迅书法艺术》。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30年，对鲁迅的了解自认为还不够。最近出版的这本《鲁迅的美术课堂》所据资料大多是鲁迅的文本及回忆鲁迅的史料，书中插图从鲁迅博物馆所藏版本及本人藏书中选取。

在中国美术史上，鲁迅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中国版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03年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中国美术的羸弱，感叹中国艺术的停滞不前。1908年，他在《科学史教篇》中，又论述了科学与美术、艺术的关系，以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认为“盖无间宗教学术美术文章，均人间文明之要旨”，“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1912年2月，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阐述了他的美术思想，辨析美术的类别，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美术的目的和功用：“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进而提出播布美术，以及建设、保护、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1912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按照《教育部分科规程》，鲁迅的业务范围是：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他极力赞同并践行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的观点。除举办讲座、撰写文章外，还积极参与筹办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的建设。鲁迅到北京后开始大量购买金石、汉画像、瓦当拓片和画谱、画册等美术类书籍。当年鲁迅购

藏的中国传统美术方面的画谱就有30多种，此外还有一些外文美术书籍。晚年他更是大量购买外国美术画谱及艺术理论书籍，在他日记书账的记载中就有600多种。鲁迅还大力收藏中外版画，现存鲁迅所收藏的中国现代版画有2000多幅，外国版画，包括德国、苏联、日本、比利时等6个国家280多位版画家的版画原作有近2000幅。鲁迅用他的藏品举办展览，让国内优秀的版画为范例指导青年创作。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碑拓及汉画像有6000多件，其中汉画像拓片有600余幅。

鲁迅还是一个美术设计师。他曾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托，设计国徽图案并执笔国徽说明书；1916年12月，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他对图书出版的装帧设计一向重视，封面、版式、插图、字号等无不精通，装帧形式、开本，甚至

纸张变化多样。他亲自设计的书刊封面有60多种，题写书名30多个，而且在书的扉页、题花、插图、版式、开本等方面都非常讲究。

鲁迅是中国现代美术革新运动的前驱者和实践者，他培育了中国版画这一新兴的美术品种，丰富了中国美术的内涵，他的美术思想指导着中国几代美术家的创作。所以著名画家吴冠中这样评价：“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这是一个有思想的美术家的由衷之言。

鲁迅在杂文《小杂感》中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希望这本小书能使读者更多了解鲁迅的爱，了解鲁迅的美术生活，以及他对中国美术事业所作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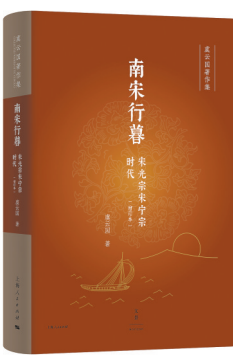
出版书单

《古希腊经济和政治》 色诺芬[古希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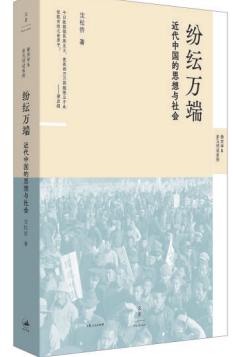
色诺芬是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称的古希腊三大历史学家之一，不仅著有《希腊史》《长征记》等后世传颂的佳作，而且撰写了很多短篇作品评其时的城邦制度与人物事件。本书就是色诺芬七篇简短论著的合集。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虞云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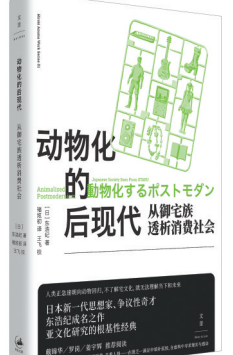
本书选取南宋从治世转入衰世的宋光宗、宋宁宗两位帝王作为研究对象，从内禅闹剧、庆元党禁、对外战事、权相专政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剖析了光、宁两朝的南宋不由自主地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沈松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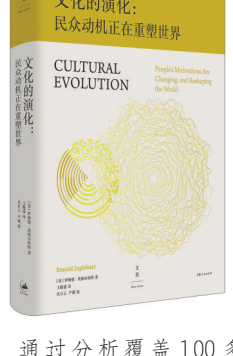
本书考察近代中国三大领域：思想与人物、政治与经济、国族与国民，从诸多细节入手，涉及胡适、章士钊等知识分子的上下求索，土匪、列强、豪绅、军阀诸多势力盘踞的宛西“乱”世界，乃至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在近代引发的新讨论……以小切口展现纷纭万端，但样样不简单。

《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浅析消费社会》 东浩纪[日] 著



当代文化研究的根基性经典，书中原创性地运用“数据库消费”“萌要素”“动物的时代”等概念，精辟地分析了御宅族系文化影响下的日本社会和思想，并从中理出御宅族系文化的形成与未来的可能性。

《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美] 著



通过分析覆盖100多个国家、长达40多年的调查研究数据，指出文化的演化与生存安全水平的关系。